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72
9 Dec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七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2月7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

(阿根廷)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讲话
- 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执行〔41〕
- 《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纪念〔38〕(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1点05分开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讲话。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阁下光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戈尔巴乔夫主席（以俄语发言）：

我们来到这里向联合国致以敬意，联合国越来越显示出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中充当独一无二的国际中心的能力。

我们来到这里向联合国的尊严致以敬意，联合国能够积聚集体智慧和人类的意志。

最近的事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世界需要联合国，联合国组织本身需要所有会员国的积极参与，需要他们对其倡议和行动给予支持，并需要他们丰富其活动的潜力和有独创性的贡献。

一年多一点前，我在《安全世界的现实和保障》(A/43/574)一文中就联合国关心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此后的时间又提供了耐人思索的新鲜资料。世界的发展确实到了紧要关头。

苏联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鉴于我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性改革具有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巨大潜力，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人们正确地理解我们。

因此,我们来到这里在这个最有权威性的世界机构发言,并向它倾诉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它最先听到我们新的重要决定。

跨入21世纪时,人类将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已经被这个并不太遥远的未来强烈地吸引住。我们怀着最美好的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期待着21世纪的到来。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同本世纪初、甚至本世纪中期的世界截然不同。世界继续变化,就象其所有的组成部分继续变化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变化的基本性质的另一个不幸事件。核武器是一种物质象征和绝对军事力量的表示,它同时也暴露了这种力量的绝对限制。人类生存和自我保存的问题摆到了显著的地位。

我们正看到十分深刻的社会变化。不管在东方还是南方,不管在西方还是北方,数亿人民,新的民族和国家,新的人民运动和意识形态走到历史最前列。基础广泛和汹涌澎湃的人民运动以多面的、矛盾的方式表达了对独立、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渴望。使整个世界秩序民主化的主张变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

同时,科学技术革命将我们最近还当作全国问题或区域性问题处理的许多经济、食物、能源、环境、新闻和人口等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和运输工具的发展,世界好象变得更加看得见和摸得着了。国际交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今天,维持任何类型的封闭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彻底审查将整个国际合作问题当作普遍安全的主要因素来处理的方法。世界经济正变成单一的有机体。不论其社会制度或经济地位如何,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这个有机体外正常发展。

这就要研究是否有必要为世界经济的运作设想一个全新的机制、一个新的国际分工结构。

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暴露了传统工业化的内在矛盾和限制。工业化的进一步

扩大和加强带来了环境方面的灾难。

但是，仍有许多国家没有足够发达的工业，一些国家至今还没有超越前工业阶段。主要问题之一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是仿效旧的技术模式，还是它们能够参加寻求不污染环境的生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扩大为严重的全球性威胁。因此需要开始寻求全新的工业发展，一种符合各国人民和各国利益的工业发展。

简言之，新的现实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形势。过去遗留下来的分歧和矛盾正在减小，或者正在被取代。可是新的分歧和矛盾又在出现。一些过去的分歧和争端正失去其重要性。但是，不同的冲突又在取而代之。

生活正在使我们放弃僵化和陈旧的观点，生活正在使我们丢掉幻想。关于进步的性质和标准这一观念本身正在改变。如果以为今天困扰人类的问题可以用过去运用过或者似乎奏效的手段和方法加以解决的话，那将是幼稚的想法。确实，人类在各种各样条件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聚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属于过去的实践，属于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过去的一部分的世界。这是表明历史目前阶段关键性质的迹象之一。

最伟大的哲学家寻求掌握社会发展的法则，为这一主要问题找到答案：如何使人的生活幸福、公正和安全。两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历史的性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根本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向。这两大革命以各自的方式给人类进步以巨大的动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两大革命形成了今天社会意识中依然盛行的思想方式。它是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但是，今天我们却面临着一个不同的世界。对于这一世界我们必须寻找一条不同的通往未来的道路。在寻找过程中，我们当然必须从积累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并且意识到昨天的局势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局势之间的根本差别。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些任务的新颖及其困难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进步是由全体人类的利益形成的。意识到这一点促使世界的政治也应

当同样地受到全体人类价值的至高无上性的指导。

过去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战火四起、鏖战屡见不鲜、几乎造成相互毁灭的历史。这些岁月在社会和政治利益冲突、民族敌对、意识形态或宗教不容异己中流逝。所有这一切确实发生了。甚至时至今日，许多人还想让这些过去的残余作为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得到接受。

但在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仇恨和分裂的同时，另一种具有同样客观原因的倾向正逐渐强大，这就是一个相互联系和整体世界出现的进程。今天，当我们走向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时候，只有通过寻求全体人类协商一致才能取得进一步的世界进步。

我们已经到达了放任原始力量自流便会导致僵局的地步。国际社会必须学会善于塑造和指导发展，从而维护我们的文明，使它对所有人都安全，并更能导致正常的生活。

我们所谈论的合作可以被准确地称为共同创造和共同发展。“损人利己”的发展方式正在消失之中。鉴于现有的现实，任何损及个人和国家的权利和自由、或损及自然的真正进步是不可能的。

解决全球问题的努力要求各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潮流——不分意识形态或其它差别——具备一种新的相互作用的范围和质量。

当然，基本的改革和革命的变革将继续在各个国家和社会结构内发生。过去是这样，今后也将是这样。但是同样地，我们的时代标志着一种改变。如果内部变革仅仅沿着别人的“平行道路”发展，又不利用外部世界的成就和平等合作所固有的潜力，那么这种变革再也无法推动其国家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内部发展的任何旨在随着某人的爱好来改变其方向的干预，势将对建立一个和平秩序造成更具破坏性的后果。

过去，差异通常是造成相互排斥的因素。现在，差异则有机会成为相互充实

和相互吸引的因素。

社会制度的差异、生活方式的差异、对某些价值观念的偏爱的差异，形成利益的差异。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但是同样有一个不可逃避的需要，即寻求在一个国际框架内平衡利益的需要。这种平衡已经成为生存和进步的条件。

对所有这些作了思索以后，人们得到了如下的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想要考虑过去的教训和目前的现实，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世界发展的客观逻辑，我们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来改善国际局势，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必须共同致力于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就基本的、真正普遍的先决条件和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则达成协议。

显然，例如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再也不能、或者必须不再构成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这首先适用于核武器，但这并非是唯一重要的事。我们大家、并且首先是我们中的强者必须力行自我克制，完全排除任何对外使用武力。这就是我们在《新德里宣言》中与印度一起宣布作为一个理想的非暴力世界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请大家一起这样做。

毕竟，现在已经很清楚，扩充军事力量不会使任何国家无所不能。而且，一边倒地依赖军事力量最终会削弱国家安全的其它组成部分。

同样清楚的是，自由选择的原则是强制性的。不承认这条原则对世界和平具有极其严重的后果。不管以什么样的借口和美妙的词藻，剥夺人民这一权利意味着危及已经取得的脆弱平衡。自由选择是一项普遍原则，不应有任何例外。

这条原则是绝对性的，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并不仅仅是出于良好的用意。对今天客观倾向的不偏不倚的分析迫使我们得出了这一结论。

这些倾向愈来愈表示出这样一个特征，即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日益具有多种选择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都是如此。过去几十年从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多样化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客观事实要求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立场，容忍，将不同事物看作并非一定为坏事和敌意的意愿以及在继续保持分歧和并不总是相互一致的情况下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的能力。世界已呈现其多样化，因此试图轻视他人并将自己那种形式的民主教授给他人的做法是完全不妥当的，更不用说用于出口的民主价值往往很快就会一钱不值。

因此，我们所说的是多样化中的一致性。倘若我们在政治上申明这一点，倘若我们重申支持选择的自由，那么那种一些人是由于上帝的意愿，而另一些人只是由于偶然才生存在地球上的观点就没有其存在的余地了。是抛弃这种思想并相应地制定我们的政策的时候了。这将为加强世界的一致性开创前景。

新的阶段也要求各国间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我们并不是在放弃我们自己的信念、哲学或传统，我们也不敦促其他人放弃他们的信念、哲学与传统。但是，我们也不想被自己的价值所束缚。这种束缚会造成智力上的贫乏，因为那意味着排斥发展的一个强大源泉——即交流每个民族独创的新颖事物。

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让每一个国家表现出其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的长处——是以真正的行动、而不是仅仅以口头宣传来表示。那将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公平竞争。但这种竞争绝不应扩大到各国间关系中。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解决任何世界性的问题，例如：在各国间发展范围广泛的互利平等合作；有效地利用科学与技术革命的成果；改革世界经济和保护环境；消除落后状况，根除饥饿、疾病、文盲和其它全球性的灾祸。同样，我们将无法消除核威胁和军国主义。

以上就是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时我们对世界发展模式的想法。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在声称已掌握了最终的真理。但是，在对过去和新出现的现实进行了彻底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应遵循上述方针，共同寻求实现普遍性的人类思想战胜诸多离心势力的途径，寻求维护在整个宇宙中也许是仅存的文明的生命力的途径。

这种看法是否有点过于浪漫呢？我们是否高估了世人社会意识的潜力和成熟程度呢？在我国和从我们的一些西方伙伴那里，我们曾听到过类似的疑虑和问题。

我相信，我们并没有脱离现实。在世界上已出现了以不同方式促使和平时期到来的力量。各国人民和许多阶层的公众的确热忱地希望改善局势，他们希望学会合作。这一趋势之强有力，有时令人惊讶。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趋势正在开始形成政策。

在哲学态度与政治关系方面出现的变化造成了可靠的前决条件，有助于根据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客观进程提供强大的动力，推动为在各国间建立新关系而做出的努力。甚至那些其活动曾为从事冷战、有时与冷战的最严重阶段有关的政界人物现在也在得出适当的结论。在所有人中，这些人尤其不容易放弃旧框框和过去的作法。如果说甚至这些人都在改弦更张，那么，显然，当新一代接上来时，机会将会增多。

简言之，对和平时期必要性的了解正日益普及并开始占上风。这就有可能在创造更健康的国际环境和实现裁军方面真正迈出最初的一步。

这会造成什么实际影响呢？不要放弃已经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成果基础之上，在我们一道取得的所有成果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这是理所当然和明智的。我指的是关于核军备、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谈判进程，及为寻求政治办法结束区域性冲突的努力。当然，我指的首先是政治对话——一种更认真、更开诚布公、涉及问题实质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交换建设性的看法，而不是相互指责。没有政治对话，谈判进程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我们对不远的未来和更遥远的未来的展望是相当乐观的。不妨看看我国与美国之间关系中出现的变化。相互了解一点一点地开始发展，信任的因素开始出现，无此则很难在政治上取得进展。

在欧洲，这种信任的因素更多。赫尔辛基进程是一个伟大的进程。我相信，这一进程依然完全有效。必须维护并加强这一进程的哲学、政治、实际和其它方面，同时应考虑到新的情况。

当前的现实使得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和巴西这些大国以及其它大、中、小国家，必须持续和积极地参加为保证国际事务的正常和建设性的演变而进行的对话。

我赞成更加生气勃勃和实质性的政治对话，赞成加强改善国际气氛的政治前提。这将使许多问题更容易切实解决。这也许是条艰难的道路，但却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每个人都应努力推动使这个世界更加团结。这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如何保证世界的团结和国际关系的稳定和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一问题。

然而，在我与外国政府和政治领导人进行的二百多次会谈中，我有时可以感觉到他们对如下事实的不满，即在这一关键时候，他们出于种种理由有时觉得在世界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们好象被撇在一边。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状况，这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

如果尽管有不同之处，我们实际上同属于一个文明，如果我们认识到现代世界的相互依存性，那么，这一事实必须日益体现在政治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实际努力之中。也许改革一词在这里并不太恰当，但我确要呼吁建立新的国际关系。

我深信，我们的时代和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求使对话和谈判进程国际化。这是我们在研究近年来正在获得势头的全球趋势和参加世界政治时得出的主要和最普遍

的结论。

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面临着联合国的新作用问题。我们感到，各国必须审查自己对联合国的态度，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独特的机构世界政治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联合国重新发挥其维持和平的作用这再次表明它有能力协助会员国处理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努力使它们之间的关系人情化。

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创建不久就受到了冷战的打击。它在许多年中成为宣传战和持续政治对抗的场所。请历史学家去争论各方责任的大小吧。今天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做的是从联合国这一段违背这个组织的根本意义和目标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最痛苦和重要的教训之一是一再坐失良机。结果，在某一时期，联合国的权威下降了，其许多行动的企图失败了。

联合国重新发挥作用和国际气氛的改善联系在一起，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某个方面来说，联合国把不同国家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它是唯一能够把各国的双边、区域和全球努力汇集成一股潮流的组织。

在自然属于联合国负责范围的所有领域——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环境和人道主义领域——中，新的前景正在打开。例如，发展问题，这是一个真正普遍的人类问题。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成千万人的生活条件正成为对全人类的实际威胁。

任何封闭的实体或甚至区域性国家共同体，不管多么强大，都无法解开堵塞世界经济关系主要渠道的症结——南北、东西、南南、南东、以及东东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的是协同努力和考虑到所有国家集团的利益，这只有联合国这个组织能够做到。

外债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殖民主义时代，发展中世界以无数损失和牺牲为代价，资助了世界社会一大部分的繁荣。现在是补偿在向全球物质进步做出历史性的悲惨贡献时所遭受的损失的时候了。

我们相信，使我们的方法国际化也是这方面的一条出路。现实地看问题就会使人不得不承认，所积累的债务无法按原先的条件偿还或收回。苏联准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偿债实行最长可达100年的长期暂停偿付，并在不少情况下干脆把债务一笔勾销。

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请各会员国考虑以下几点：根据每个国家的经济实绩限制它们偿付官方债务的款额，或让它们长期推迟偿还一大部分债务；支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有关减少对商业银行所欠债务的呼吁；保证政府支持市场安排，协助第三世界解决债务问题，包括组织一个专门的国际机构，削价回收债权。

苏联赞成在多边论坛上就如何解决债务危机问题进行一次实质性讨论，包括由债务国和债权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磋商。

除非不仅同裁军而且和消除对世界环境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否则国际经济安全是不可想象的。在某些地区，环境现状简直令人可怕。现已订于1992年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次环境问题会议。我们欢迎这一决定，正在努力使这次会议产生与该问题的规模相称的结果。

但是，时不我待。许多国家正在进行大量的努力。这里我要再次极力强调，裁军进程——特别是核裁军进程为恢复环境带来的新的前景。

让我们也考虑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紧急环境援助中心，中心的职能是向环境严重恶化的地区及时地派出国际专家小组。苏联也准备提供合作，建立一个国际外空实验站或载人轨道站，专门用于监督环境状况。

在整个外空探索领域中，未来外空工业的雏形越来越清晰。苏联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外层空间的活动必须排除在外空出现武器。这里也必须有一个法律基础。这一法律基础的基础——1967年条约和其他协定的条款——已经存在。

然而，人们已经强烈地感觉到需要为外层空间的和平工作制定一个全面的制度。该制度执行情况的核查工作将委托给一个世界外空组织。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建立这一组织的建议。我们准备把我国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纳入该组织系

统。 我们已经决定把这一雷达站划归苏联科学院领导。 苏联科学家准备迎接外国同事，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拆除和重新安装某些部件和结构，并提供新的设备，把这个雷达站变成一个和平合作的国际中心。 整个体系将在联合国主持下运作。

全世界都欢迎本组织和本组织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及他的代表解开区域性问题的努力。 请允许我谈谈这一问题。 套用海明威用来作为他的著名小说的题引的英国诗人的话，我要说，区域冲突的丧钟乃是为我们大家而鸣。

这样说特别正确，因为这些冲突正发生在第三世界，它们已经面临许多如此严重的弊端和问题，因此必然成为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1988年也给我们大家都关心的这一领域带来了一线希望。 在几乎所有的区域危机中人们都已感到了这种希望。 在某些危机方面已有行动。 我们欢迎这些行动，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促进这样的发展。

我只谈阿富汗问题。

《日内瓦协定》的根本意见和实际意义已受到世界各国的赞扬，它为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解决的进程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没有实现。

这一不幸的事实又一次向我们说明了一条罗马格言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意义，这条格言就是“*Pacta sunt servanda!*”——条约必须遵守。

我不想利用这一讲坛指责任何人。

但是我们认为，在联合国的职权范围内，今年11月份通过的大会决议可以辅之以一些具体的措施。

用该决议的措辞来说，为了使阿富汗人民自己迫切就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问题达成全面解决，应该采取下列步骤：

自1989年1月1日起在所有各地完全停火，并停止所有进攻行动或炮击，在谈判期间，各阿富汗反对派组织可保留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一切领土；与此相联系的是，自同日起停止向所有交战各方提供任何武器；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在

建立一个广泛基础的政府期间，向喀布尔和阿富汗其它战略中心派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我们还请秘书长协助早日实现关于召开阿富汗中立化和非军事化国际会议的提案。

我们将继续最为积极地协助医治战争创伤，并准备同联合国和在双边基础上为此项努力进行合作。

我们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支自愿性的国际和平队以帮助重建阿富汗的提案。

在解决区域冲突问题方面，我不得不对最近影响了本届会议工作的严重事件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美国政府不允许一个在联合国具有观察员地位的组织的主席来纽约向大会发表讲话。我是指亚西尔·阿拉法特。

此外，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采取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步骤，以便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参与下协助寻求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值其它区域冲突已经明显出现了趋于政治解决这一积极倾向，而其中有许多进展是由苏联和美国协助而达成的。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深表遗憾，同时我们还表示声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全面国际安全这一理论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并基于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我们主张国际关系非军事化，因此，我们希望使用政治与法律方法来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

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基于法治，并将各国的外交政策活动置于法律制约之下的世界社会。

如果在联合国范围内能就国际法的原则与准则、以及在适当考虑到新的条件编纂这些原则与准则、并为新的合作领域发展法律准则各方面形成统一认识，达成意见一致，那么将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

在核时代，国际法的有效性不应基于对国际法的执行，而是应当基于反映各国利益均衡的准则。

人们日益意识到我们的命运有着客观共同性，除此之外，上述原则将会使每一个国家都在国际法约束的范围内真正力行自我克制。

使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仅意味着世界社会所有成员在解决问题的各种努力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国际化。同时还意味着使这些关系人情化。

只有当人类和人类所关心的问题、人类权利和自由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的时候，国际关系才能充分反映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才能有效地服务于他们的共同安全事业。

在这方面，我想代表我国以及我本人高度赞扬四十年前，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意义。

今天，这一文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文件同时也反映了联合国各项目标与任务的普遍性。

一个国家纪念《宣言》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改善国内状况，以尊重和保护其公民的各项权利。

在我向各位介绍我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步骤之前，我想说下面这些话。

我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真正革命性的腾飞阶段。

改革进程方兴未艾。我们是从制定改革这一理论概念入手的。我们必须对各种问题的性质及程度做出评价，理解过去的种种教训，然后再以政治结论与方案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完成。

理论工作，对目前形势的重新评价，对政治立场的定型、丰富和调整尚未完成。我们正在继续做这些工作。

但至关重要的是应当从一个总的概念开始，正如过去几年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

这一概念已大体上证明是正确的，舍此别无其他选择。

要想使我们的社会参与实施各项改革方案的努力，就必须在实践中实现我们社会的民主化。在民主的旗帜下，改革现在已经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

我们已经开始了根本的经济改革。我们已经获得了经验。明年年初整个国民经济将被指示采用新的业务形式和新的业务方法。这也意味着极大地重新组织生产关系，并意味着将蕴藏在社会主义财富中的巨大潜力解放出来。

在进行如此大胆的革命性变革中，我们认为到可能会犯错误，会遇到阻力，新的方法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也预见到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放慢速度。

但是，对整个权力和政府体制的深刻民主改革得以保证使改革的总进程稳步地向前发展，并日益壮大。

随着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决定修改《宪法》并通过《选举法》，我们完成了政治改革进程的第一步。

我们一鼓作气地开始了这一进程的第二步，着重按我们从十月革命中继承的列宁国际主义原则改善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改组苏维埃权力的地方制度。

我们面临着大量的工作，而且各项主要工作要同时进行。

我们充满了信心。我们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还有党这个改革先锋队的领导。党正根据新的任务和整个社会中的根本性变化进行着自身的改革。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各族人民和各代公民都支持改革。

我们正在深深地致力于建设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一系列新法的工作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

许多新法将很快地于1989年生效，我们期望这些新法能够在保证个人的权利方面达到最高的标准。

苏联的民主将建立在坚实的规范基础之上。我在此特别提及的是有关良心自由、公开性、公共结社和组织和其他许多方面的法律。

监禁的场所将不再关押因政治或宗教信仰而被判罪的人。

新的法律草案中将规定进一步的保证，以排除因政治或宗教信仰而遭受任何形式的迫害。

当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犯有实际刑事罪或国事罪诸如间谍、破坏、恐怖主义等罪行的人，不论其政治或思想信仰如何。刑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制定，并正等待批准。被修改的条款中包括有关死刑的条款。

出入我国的问题——包括出国与家人团聚的问题，正本着人道的精神加以解决。正象大会所知，拒绝出国的原因之一是当事人掌握了机密。现在要对机密规定实行严格的时限保障。在某些机构或企业谋职的每个人将获悉这一规定。如有争执，有权根据法律上诉。这样，所谓的遭拒绝的人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苏联将更多地参加联合国和欧安会监督人权的活动。我们认为海牙国际法院有关人权的解释和执行方面的司法权应对所有国家有约束力。我们把停止干扰所有向苏联发射的外国无线电广播作为赫尔辛基进程的一部分。

总之，我们的信条是：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以人道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

现在我谈谈裁军这一主要问题，不进行裁军，未来世纪的任何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军备竞赛和思想的军事化扭曲了国际发展和交流。正象大会所知，苏联于1986年1月15日提出了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方案。这一方案转变成了谈判中的实际立场，并已产生了具体的结果。明天是《中导条约》签署一周年。因此，我极其高兴地看到《中导条约》——销毁导弹——正在信任和务实的气氛中正常地得到执行。这样，我们在貌似坚不可摧的怀疑和敌意之墙上打开了一大缺口。我们看

得一个新的历史现实正在出现——由超军备的原则转变为合理的数量足以防御的原则。

现在，一种保证安全的新模式正在诞生。这一模式的建立并不是通过过去无一例外的军备集结，而是通过在妥协基础之上的军备的削减。苏联领导决定再次表示愿意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巩固这一健康的进程。

今天，我可以向各位报告，苏联已经决定削减其武装力量。在今后的两年中，武装部队将削减50万人。常规军备也将大大削减。这将是苏联单方的行动，并不与维也纳会议授权的谈判挂钩。

经华沙条约组织同盟国同意，我们决定在1991年之前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6个坦克师，并将其解散。突击机降部队和其它几个编队及分队，包括强渡分队及其武器和战斗装备也将从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军团中撤回。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部队将减员五万人，装备减少坦克五千辆。

目前在盟国领土上的苏联所有师级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其结构将与目前的结构有所不同；在大量削减坦克后，这些部队将明显地成为防御性部队。

同时，我们将削减驻扎在苏联欧洲部分的武装部队的数量和军备量。在我国欧洲部分和我们欧洲盟国领土上的苏联武装部队总共将削减一万辆坦克，八千五百个火炮系统和八百架战斗机。

在这两年中我们也准备大幅度削减在我国亚洲部分的武装部队。根据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临时驻扎在该国的苏联部队的主要部分将撤回国内。

在采取这一根本决定时，苏联领导人表达了已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革新的人民的愿望。我们将在合理和可靠充足的水平上保持我国的防御能力，使任何人都无法侵犯苏联和我们盟国的安全。

通过我们为使国际关系非军事化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愿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另一个紧迫的问题——将军备经济转变为裁军经济的问题。转化军工生产这一思想

现实吗？就这一问题我已经谈过了。我们认为这的确是现实的。

苏联准备采取以下步骤：在我们经济改革的构架内，起草和公布我们转化经济的国内计划；在1989年，为两个或三个国防工厂制定转化计划作为试点；公布向军事工业专家提供就业和将其设备、建筑和结构用于民用生产的经验。

各国，首先是主要军事大国，向联合国提交其本国的转化计划是可取的。建立一个科学家小组，对整个转化问题及其在各具体国家和地区的贯彻进行彻底分析，并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然后由大会的某届会议审议，这也是有益的。

最后，鉴于我身在美国国土上，而且出于其它明显的理由，我要谈谈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关系的问题。整整一年前在我对华盛顿进行难忘的访问期间，我曾有机会看到美国是多么好客。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已有五十五年的历史。随着世界的变化，在世界政治中苏美关系的性质、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很长的时期里，两国关系是在公开或秘密的对抗有时是敌意中发展的。然而在过去几年中，由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系在实质和氛围上都有好转，全世界松了一口气。

没有人想低估我们之间严重的分歧和棘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从学习相互了解和寻求符合我们自己和双方的共同利益的解决办法的小学里毕业了。

苏联和美国建立了最大的核导弹武库；然而正是这两个国家在具体地认识到了它们的责任之后，首先缔约削减和消除对两国和所有其它国家构成威胁的军备的一

部分。两国拥有最大和最尖端的军事秘密，然而正是这两个国家为消除军备以及削减和禁止军备生产的相互核查制度奠定了基础并且在进一步发展这一制度。正是这两个国家正在为未来双边和多边协议积累经验。

我们珍视这一点。我们承认并赞赏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及他的政府成员特别是乔治·舒尔茨先生作出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对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业进行的共同投资。我们不应

丧失这笔投资，或将其弃置不用。

以当选总统乔治·布什为首的下届美国政府将发现我们是一个不会长时间停步不前或倒退的伙伴，而是将继续本着现实、开放和善意的精神进行对话，乐意为包括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主要问题在内的议程而努力并取得具体的结果。

我想的首先是为在保留《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同时缔结削减百分之五十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所作的不断努力；制定出一项消除化学武器的公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使1989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的前提是存在的；就削减欧洲的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进行谈判。

我还想到最广义的经济、环境和人道主义问题。

若将国际局势的积极变化完全归功于苏联和美国那就不太对了。

苏联高度赞赏社会主义国家在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国际环境的进程中所作的重大和创造性的贡献。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时刻意识到其它核与无核大国的存在。

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当然也包括不结盟运动和跨洲的六国集团，正在发挥极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我们莫斯科人十分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政治、党务和知名人士、以及——我想强调这一点——科学家、文化界人士、群众运动和各教会代表和所谓人民外交活动家，都愿意肩负起普遍的责任。

在这方面，我相信在联合国主持下定期召开公共组织大会的想法值得重视。

我们并不倾向于把世界局势简单化。

不错，裁军的趋势已经得到了有力的推动，该进程正在得到自身的势头。但它尚未成为不可逆转。

不错，人们强烈感到放弃对抗、主张对话与合作的意愿。但它还远未成为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永久性特征。

不错，趋于一个无核武器、无暴力世界的动向能够大大改变我们星球的政治和思想特性。 但还只是迈出最初的一步，而甚至这些也受到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的怀疑和遭到抵制。

人们继续感到过去的遗产和惰性。 深刻的矛盾和许多冲突的根源尚未消失。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和平时期将在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存在和竞争的情况下出现。

然而，国际努力的主攻方向和新思维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应当给这一竞争以一种合理竞赛的性质，并适当考虑到选择的自由和利益的平衡。 这样从全球发展的观点来看，它就会变得更有益和富有成效。

否则——若军备竞赛象以前一样继续为其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竞争将是致命的。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民——领导人和普通人——正在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我怀着与开始讲话时同样的心情——即对我国人民和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心情，结束我对联合国的首次讲话。

我们是在对联合国来说如此重要的一年的岁末相会，也是在我们对之寄予厚望一年的前夕相会。

我愿相信，我们的希望将相应地伴之以共同的努力，以结束战争、对抗和区域性冲突的时代，结束对自然的侵犯，结束饥饿和贫困的恐怖以及政治恐怖主义。

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只能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感谢他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厅。

下午 12 点 05 分休会，下午 12 点 15 分复会。

议程项目 41

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执行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这一问题我收到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的一封信，他请求将该项目推迟到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

如果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希望将该项目推迟到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并将其列入该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 41 的审议。

议程项目 38（续）

《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纪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将记得我在 12 月 5 日星期一关于《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纪念的一个通告。牢记这一纪念极其重要、意义极其重大，因此许多代表团在发言者名单上登了记，我再次考虑了这一问题。因为发言者众多，在坚持并强调呼吁各代表团发言尽可能简短的同时，我向大会建议明天再次举行会议审议这一项目。然而，这意味着大会要作出了一项决定，否定第 42/131 号决议第 7 段，根据该段决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将以一次全体会议用于这一纪念。

我能否认为大会决定将这一纪念延长至两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2 点 25 分散会。